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南湖论丛

曾庆全 / 著

南湖论丛【第一辑】

本书论述了诗歌、元曲、传奇的时代发展特征。其中有对当下古典文学研究热点的关注，有对历史上存在争议的作家的论辩，有对曾经被我们忽视的作家作品的挖掘，也有对文体历史发展演变的梳理。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论述层层深入，为读者的再思考打开了另一个全新的视角。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ZHONGGUO GUDIAN WENXUE YANJIU

曾庆全 / 著

南湖论丛【第一辑】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曾庆全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622-7154-3

南湖论丛(第一辑)

I. ①中… II. ①曾…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838 号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 曾庆全 著

责任编辑:张梦赉 何国梅

责任校对:王 胜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兴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王兴平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7.25

字数:134 千字

版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第一部分 魏晋诗人四议

一、曹丕、曹植之优劣	3
二、傅玄之短诗	6
三、张华之“风云”	9
四、潘岳之《闲居》	11

第二部分 元曲五剧评析

一、《赵氏孤儿》	17
二、《李逵负荆》	20
三、《张生煮海》	22
四、《倩女离魂》	24
五、《陈州粳米》	27

第三部分 明清传奇简史

第一章 名称和渊源	33
一、传奇的含义	33
二、传奇和其他文艺形式的关系	34
第二章 发展概况	37
一、前期:缓慢发展	37
二、中期:创作繁荣,名家辈出	38
三、后期:逐渐衰落	40
第三章 主要作家和作品	43
一、元末明初“四大院本”	43
二、《琵琶记》	49
三、弋阳腔和民间传奇	52

四、昆山腔和《浣纱记》	57
五、《鸣凤记》、《红梅记》、《东郭记》、《玉簪记》	59
六、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	67
七、李玉的剧作	72
八、洪昇的《长生殿》	76
九、孔尚任的《桃花扇》	81
第四章 剧本编写	87
一、结构	87
二、文辞	90
第五章 舞台演出	93
一、戏班组织和舞台场所	93
二、角色行当	93
三、衣装和脸谱	94
四、砌末装置	96
五、表演艺术家	96
第六章 研究和理论著述	98
一、徐渭的《南词叙录》	98
二、王世贞的《曲藻》	98
三、临川派和吴江派的争论	99
四、王骥德的《曲律》	101
五、吕天成和祁彪佳的《曲品》	102
六、李渔的《闲情偶寄》	103
第七章 传奇的影响	106
一、声腔剧种的流变	106
二、剧目的演变发展	107
三、主题人物的衍承	108
四、表演艺术的传统	109

第一部分
魏晋诗人四议

一、曹丕、曹植之优劣

曹丕和曹植的优劣问题,指两人文学作品质量的优劣和人品的高下,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自古迄今,有影响的批评者约三家,即刘勰、王夫之和郭沫若,其他如徐祜卿、王世贞、贺贻孙等,虽时有抑扬,但不过是浮光掠影,影响不大。

两人的人品高下姑且不论,就文学作品而言,我认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抓住了某些要害。《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事实正是如此:曹丕因其帝王的身份,其才力和成就被世人所看轻,而曹植因处境困窘多为人所推崇。刘勰认为这不是公平的态度,乃“俗情”的主观爱憎作怪。是的,如果不看作品实际,只是先入为主,从作者的地位处境出发作褒贬,是非理性的,难以服人。然统观两人所遗于今的诗文,又不能不认为,刘勰所总结的历史情况,是客观事实,公平而正确。而刘勰之所以认为两人各有千秋,不分轩輊,实因只从他们作品的外在风格和写作方式着眼,忽略了作品的内涵和情思。然而深厚的内容和丰富的情思才足以感动读者,使其为之赞叹。所以我以为曹植的文学成就远比其兄高,其作品的内涵和情思是曹丕所没有的。

诚然,就艺术表现而言,曹丕是很有特色的。《燕歌行》为七言歌行之先声,然只重复宋玉《九辩》、《古诗十九首》的某些意境,新意不多,但毕竟是一代新声,后人给予充分肯定,是应该的。四言乐府如《善哉行》、《秋胡行》、《丹霞蔽日行》等,风格清漪,行文从容,写物淡美,言情温雅。杂言如《大墙上蒿行》、《艳歌何尝行》等,内容虽不出《古诗十九首》的范围,但格调清畅。他的古诗比乐府成就高,《黎阳作》、《至广陵于马上作》等,记征程的辛苦与豪情,有气势,有生活;《于玄武陂作诗》、《芙蓉池作诗》诸篇,着色清艳、对偶成文,见出后代景物描绘和绮丽错采的消息,足可玩味。但不能否认,曹丕的全部诗作,缺乏激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可以把玩,却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使其为之极喜,为之极悲,为之隐痛,为之深愁。为什么呢?因其内容单调而贫乏,无关读者之切身痛痒和爱憎,仅有浮泛的感情和外在的美,是抓不住人心的。

读曹植的诗则不然。风格之绮丽,想象之丰富自不弱于乃兄,而最动人心魂处,与其说是艺术形式之功,不如说是诗人以激情和热血凝结成的悲剧性的内涵。《赠白马王彪》组诗,承《国风》叙事抒情相融合的传统手法,取《大雅》之《文王》、《下武》、《既醉》的章法,蝉联递接,时起时伏,从心底流出的悲愤之音,是血泪凝和而成

的。《送应氏》所表现出的凄凉背景和复杂心情，乃战乱浩劫年代的典型之笔。《杂诗七首》存拟古之痕，但是，“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的旷荡之境，“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的深沉之叹，“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慷慨之心，“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的严峻之论，都是从屈原《离骚》发展而来的，扩展了乐府和古诗的内容，其崇高的品质不是曹丕所具有的。他的另一些赠答诗，饱含因受压抑而求友声的至笃之情：“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蕡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干》）；“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赠丁仪》）；“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赠王粲》）等孤鸣之声，都渗透着人生的痛感和对理想的追求。再如《美女篇》的采桑女，与罗敷同一容态，却是作者渴求进取不得如愿之心态的外观化；《野田黄雀行》以黄雀、罗网暗示着世途的险恶，人生的挣扎。这种种意象和情态，总是强烈地触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人生的联想。然何以能够如此呢？在整个封建社会，多数人，包括多数文人才士，都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压抑折磨之痛，也大都具有恋亲惜友、忧世念国、建功立业的热情。曹植的诗，种种意象，不论是含蓄的、舒放的、象征的，还是质朴的、壮美的、幽艳的，大都能够投合多数人的心魂，引出他们的激动，千载而下，锐感相通，仍能觉得它很美、很崇高、很亲切。曹丕的诗，却不具有这样丰富的特质，不能给人带来鲜活的、立体的印象，不能产生热烈的共鸣，这就是他受到读者贬抑，无法和曹植并驾齐驱的原因。

自然，曹丕著有《典论·论文》，气度不凡、立意高远，为文学专论之祖，非子建所能及。也如曹植有《求自试表》，激情如火、壮志干云，《洛神赋》的云蒸霞蔚、神光离合，亦非曹丕所能具，各有千秋，原不必类比，一较高低。曹植捷于才思，曹丕力缓虑详，并非造成不同成就的主要原因。刘勰于《神思篇》中曾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如张衡和左思，十年作赋而成；淮南王和枚皋，下笔即构大赋。但是，“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将他的论述拓开来看，所谓“博练”和“才学”，当然源于作者的生活和经验。可以设想，曹植如果不受其兄侄的压制和虐待，其势不窘，哪有艰难苦恨之心？哪有兄弟同哭，友情共悲？何来少年解救黄雀之企望？岂生浮沉异路、会合无时之慨叹？如果他能大展身手，位尊权重，又怎有苦求“自试”之恳切，“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的决绝？曹丕之所以写不出曹植这样的作品，不能以忠愤之情去感染后人，岂不因他身为太子和皇帝，是迫害者、支配者、趾高气扬者，无曹植之痛楚悲酸么？可见刘勰说中了问题的核心，虽然他并不自觉，甚至持反对态度。司马迁于《报任安书》中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刘勰在总结有关丕、植的优劣批评时，似乎忘记了这一条至理名言，故所说“未为笃论也”。

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因鄙贱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狭隘门

庭,进而追溯到古人拉帮结派的源流,他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郭景纯、阮嗣宗、谢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张景阳、皆不屑染指建安之鼎羹,视子建蔑如矣!”又说:“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姜斋诗话》)王夫之所谓的“铺排整饰”无非是六朝骈俪文风,其点火煽风之责,都在曹植身上。而建安以后有成就的作家,都轻视子建,甚至不屑染指建安风骨,这当然有片面夸大之嫌。试看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作《酬从弟惠连诗五章》、《登临海峤与从弟惠连四章》,分明拟仿《赠白马王彪》的体式和格调,只是因为无曹植的生活实践,感情显得浮浅一些而已。而阮籍之《咏怀》,比喻象征,隐忧不已,跟曹植毫无联系么?不是的。清代有人曾说:“子建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陆机摹其词采。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陆一传而为大、小谢,再传而为孟浩然。”^①虽有片面机械之嫌,但其间的渊源契机还是可以寻绎的。王夫之说子桓之天才孤绝,造诣极高,无人可以攀及,实在难以索解。而此种离奇之论,却又深得郭沫若先生的赞许,“王夫之也很贬抑子建而推重文帝,可以说先得我心”^②。并以为曹植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只是徒夸张,不求统一”。于是“抒情化明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了逆流。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使乐府也渐渐脱离了民俗,由于他的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③。王夫之只说曹植以“铺排整饰”欺哄后人去趋附模仿他,郭沫若竟说曹植不过是一名低能的模仿专家,似乎五言诗和乐府民歌一经他手,就失去了诗的本色和素质,大大后退了,这都是不合诗歌发展实际的夸大之辞。本来,民间作品转入文人之手,得以扩大意境,丰富表现手法,形成新的传统,而民间文学还是按其本身的发展步骤前进,两者间互相启发,互相促进,谈不上有谁大大损害了谁,尤其是对某一个人更不可作如是观。曹植的诗歌,主要是乐府,有模仿者,有仿拟而推陈出新者,像其父兄和其他诗人一样,是在继承前人经验、向民间学习的基础上前进的。郭沫若循着刘勰和王夫之的足迹走过来,贬低曹植,抬高曹丕,也是不顾作品实际的空谈。

① 参见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

② 参见《论曹植》,见郭沫若《历史人物》。

③ 参见《论曹植》,见郭沫若《历史人物》。

二、傅玄之短诗

傅玄是西晋初期的学者兼诗人,《晋书》本传说他性情急躁,不能容物,排诋虚无清谈,矜重儒家经济,凡有政事得失,及时劾奏,待旦而发。“于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虽因此遭到打击,却本性不移,是一位刚肠嫉恶、讲究实际的正派官僚。他的诗今存七十余篇,零散之句数十,一向不如三张、二陆等人受到注意。钟嵘将他列入下品,正面不置一辞,是不评之评。刘勰说他“结藻清英,流韵绮靡”^①,成就当在潘、陆之下,而与“三张”比肩。《昭明文选》录其《杂诗》一首,直到徐陵才发现他善写儿女之情的特点,于《玉台新咏》中选录傅玄作品十四篇。明清以来,品评者颇多,但大都只着眼于他的长篇,极少注意那些短诗。明人陆时雍曾给傅玄的长篇极高评价:“傅玄得古之神。汉人朴而古,傅玄精而古。朴之至,妙若天成;精之至,粲如鬼画。二者俱妙于思虑之先矣。”精而古,是绮丽细密而有高古之气;鬼画天成,是不假人工而自然吐属。陆时雍觉得傅诗远在“病靡”的陆机之上,不似陆机之“苦于缉绣而不华”,烨烨然有生动之色,这有一些道理。傅诗比较灵动,不像陆诗那样板滞、徒见绮靡,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诗创作于魏晋之际,从三曹七子的清丽流畅转入潘、陆之辈的绮艳僵涩,他是中间状态。如《有女篇》、《青青河边草篇》、《墙上难为趋》、《秋胡行》等,或于清浅自然、行云流水间忽入荒辞累句,或者整篇文绉绉的兼有陆机之“芜”和潘岳之“净”。沈德潜说,“休奕诗,聪颖处时带累句”^②,颇为中肯。他的乐府虽重在拟,也间出新意,写现实生活,有社会意义。《苦相篇》受曹植《弃妇篇》的影响,道出“男儿当门户,坠地自生神”、“女育无所爱,不为家所珍”的实况,概括了千百年间重男轻女的悲苦人情,是汉乐府以来的最佳篇章之一。《秦女休行》拟左延年之作,写得更合情理、更生动、更有气势,扬女子巾帼之风,是有特点的。《历九秋篇》为六言五句的骚体联章,自创新格,虽写旧事常态,却饱含对妇女命运的同情:“男儿堕地称珠,女弱虽存若无。骨肉至亲更疏,奉事他人托躯。”这比那些良人远征,孤妾独愁的老套子更有意义,更朴素感人。陈沆云:“昔人称休奕刚正嫉恶,而善言儿女之情。其诗尤长拟古,借他酒杯,浇我块垒,明远、太白皆出于此。”^③有一些道理。但与其说这类诗作意存象喻,诗人另有所托,不如认为是借拟古而写现实人生,所言儿女之情,是从诗人耳闻目睹中来,不仅仅为了拟似古人,更有自己的创新。傅玄的拟诗也有极呆板、极迂腐之处。《艳歌行》拟《陌

① 参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

② 参见沈德潜《古诗源》。

③ 参见陈沆《诗比兴笺》。

上桑》，确如王世贞云：“玄之有《日出东南隅》一篇，汰去精英，窃其常语。尤有可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于意已足，绰有余味。今复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以己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①《秋胡行》也是糟糕的典型：“令人一见匿笑，再见呕啞，皆不免为盗跖、优孟所訾。”^②这也不足为奇，魏晋以来，直到鲍照之前，诗人们大都处在拟似阶段，为学习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的行文格调而反复模拟，高手如三曹和阮籍，即使写五言，也要受其影响，不时流露出汉人之作的意境，下者如陆机等在意析摹写，乃一百多年的诗学风尚，是一种必然的历程，傅玄怎能孤立地摆脱模拟的影响？

然而，读他的一些短诗，倒有一些新鲜之感，从内容到形式，似较其乐府长篇更吸引人，更见特点。这类诗共十余首，就题材说，一写儿女之情，一写纪事咏物。先看写儿女之情的几首：

雷隐隐，感妾心，倾耳听非车音。

——《杂言诗》

车遥遥兮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
君安游兮西入秦，愿为影兮随君身。
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

——《车遥遥篇》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长安。
何用存问妾？香襟双珠环。
何用重存问？羽爵翠琅玕。
今我兮闻君，更有兮异心。
香亦不可烧，环亦不可沉。
香烧日有歇，环沉日自深。

——《西长安行》

昔君与我兮形影潜结，今君与我兮云飞雨绝。昔君与我兮音响相和，今君与我兮落叶去柯。昔君与我兮金石无亏，今君与我兮星灭光离。昔君与我兮金石无亏，今君与我兮星灭光离。

——《昔思君》

白云翩翩翔天庭，流景仿佛非君形。白云飘飘舍我高翔，青云徘徊为我愁肠。

——《云歌》

① 参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② 参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这些诗,或骚或古,非歌非谣,可谓不拘一格,顺手拈来,有长有短,能把握住儿女感情的最细腻处,于陡变截转处落笔。有的韵味悠长,有的戛然而止。《西长安行》有张衡《四愁》、繁钦《定情》和汉乐府《有所思》的痕迹,然结语出奇,与“拉杂摧烧”而“当风扬灰”的心境不同,深沉含蓄。《昔思君》有屈原《离骚》“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深怨,却不见“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苦恋。这与《古诗十九首》“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曹植《七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之低回缠绵是不同的。低回悱恻已成为一种模式,看多了,便觉雷同,索然无味。傅玄此篇,却不入这种模式,读着新鲜,对陶渊明《闲情赋》中的十“愿”、十“悲”,或许是有启示的。《杂言诗》似写宫中怨女,借声传神,简净而贴切,饶有兴味,可谓后代宫怨诗的先声。《云歌》用比兴体,以白云比所爱,青云拟所不爱,表现了少男少女单思之情的怅惘和矛盾,无论遣词成章或构思立意,都有独到之处,如《诗经·山有扶苏》的“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意味虽然相同,但《云歌》显然更为动人,因它赋予所喻之形象以感情和生命,而不只作质直的叙述。这些诗,具有活泼的风格,魏晋以来是难以见到的。

另一类纪事咏物诗,是从诗人日常感受观察中得来的,时见佳句。如写寒冬之凛冽:“严风截人耳,素雪坠地凝。”截耳可怖、素雪可爱。记庭燎之辉煌:“枝灯若火树,庭燎继天光。”使人想到唐诗之“火树银花合”的场景,热闹非常。《苦雨》诗云:“霖雨如倒井,黄潦起洪波,湍流激墙隅,门庭若决河。”《炎旱》诗写道:“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一餐重丘山,哀之以终老。君无半粒储,形影不相保。”民生问题,是傅玄最关心的,泰始四年(268),他任晋武帝的御史中丞,就治水问题作长篇奏疏,足见他的诗为纪实之言。其残句如“炎景时郁蒸,海沸沙石融”,“徭役无止时,征发倾四海”,都是他那忧国忧民之心的表现。在天时纪事中注入对社会民生的关怀和忧喜,傅玄以前,唯曹植所独具,如他有《喜雨诗》云:“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嘉种盈膏壤,登秋毕有成。”《时雨讴》说:“野草萌变,化成喜谷。”能喜百姓之所喜,难能可贵。而傅玄显然表现得更为鲜明,同情人民之心更为突出。这是对纪事诗的一个突破。还有《啄木》一篇,“啄木高翔鸣喈喈,飘摇林薄着桑槐。猿猴树间喙如锥,嚶喔嚶喔声正悲,专为万物作倡俳。当此之时,乐不可回”。显然,这样的咏物诗,不如前人写斗鸡的水平。刘桢刻画斗鸡之形:“长翹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曹植写斗鸡之神:“挥羽激流风,悍目发朱光”。其形毕肖,其神奕奕,开咏物之先声,但那是华堂高宴时的把戏,傅玄把所咏对象从上层玩好转到草莱民间,风格情趣又自不同。说啄木鸟与自然万物唱歌跳舞,乐不可支,写得何等谐趣。这比许多六朝作者的咏物诗高明得多,我们仿佛能通过其咏物诗看到诗人的一颗童心。

三、张华之“风云”

钟嵘《诗品》论张华时说：“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陈延杰先生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作注，引《世说新语》注云：“华为人少威仪，多姿态。”并阐释钟嵘的用意说：“此虽讥其为人，然与文务为妍冶，与儿女情多相表里也。”照此说来，张华的性情风度和诗文格调比较婉柔轻靡，缺乏大丈夫气概。然观其存诗，则未必如此？

先看他的为人，《晋书》本传说：“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瞻多通”，“少自修谨，造次必以礼度，勇于赴义，笃于周急，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能见义而赴、遇难而急，当不尽作儿女温柔之态。又因一举一动必循礼法，自然比较拘谨、儒雅、斯文，无躁进之貌。这两种不同的表现集于一身，随境而发，可能使人难以捉摸。刘纳初入洛阳，见到诸名士大家，曾说：“张茂先我所不解。”^①可见张华的为人真有人难以揣测之处。但所谓“少威仪，多姿态”者，想也不会似何晏一般傅粉薰香，搔首弄姿。但他为什么给人这种印象呢？《晋书》又说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如看到左思的《三都赋》就大加赞赏：“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②即造成“洛阳纸贵”的空前形势。见到陆机的文章，篇篇称善，谓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于为文，乃患太多也。”^③甚至夸张地赞叹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好像司马炎以二十万大军攻降孙吴，最宝贵的收获只是得到陆机兄弟。这些话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张华以名士学者兼官僚的身份，对人对事，不够冷静，好作惊人之谈，这就给某些庄重自矜的士大夫们一种印象，仿佛他是随随便便的，过分热情，故作亲热似的。魏晋名士的所谓风度，一般崇尚自然，既通脱，又矜持，既不拘礼法，又含蕴沉静，要恰到好处，分寸得宜。而张华则表现不很平衡，时而深沉莫测，时而倾肠倒肚，当然会受到讥嘲。张华是朝廷重臣，受荀彧排挤时，出任幽州都督，安抚北方诸少数民族，来附者二十余国。频岁丰稔，兵马强盛。当贾后专权之时，他调停折冲于朝野，起到稳定形势的作用。赵王司马伦拉拢他欲行篡位之事，他坚决拒绝，引颈受戮，正气凛然。这样一位人物，可以说，骨子里是有大丈夫的“风云”之性的，儿女柔色最多只是其性格作风中的某一侧面，遇到特定的情况，不自觉地表现出来，遂受讥诮。这

① 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② 参见房玄龄《晋书·左思传》。

③ 参见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不能怪张华，是当时的某些士大夫们太装腔作势罢了。

再看他的诗歌，“务为妍冶”、“儿女情多”的作品是有的。《情诗五首》、《杂诗三首》、《感婚诗》便是代表。写“幽人”、“佳人”、“闺女”期待“王孙”、“良人”、“同好”、“君子”，而不得及时相聚，遂空帏独守，忧听草虫，觉“兰室无容光”，“重衾无暖气，挟纊如怀冰”，感叹于“荣华不再阳”，发出“不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的激昂之声。在这类诗里，“妍冶”之态，琢饰之巧，是不时可见的：“巧笑媚权厖，联娟眸与眉”（《情诗》之二）；“白苹齐素叶，朱草茂丹华，微风摇茝若，层波动芰荷，荣彩曜中林，流声入绮罗”（《杂诗》之二）。前者极力刻画女子的媚态巧笑，后者铺陈物色，描绘居处环境的良辰美景。这些诗，实开陆机绮靡之风，正如清人何焯所云：“女郎诗也。”^①很明显，张华是从《古诗十九首》和王粲、曹植等人的某些作品中学来，却又遗其具体的托讽内涵，徒事表面文字，读多了，只觉是凿空乱道，故作多情，并无感人之处。其实，这只是一些没有标明的“拟古”诗，如谢康乐所说：“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②不是张华的佳处。

代表张华诗歌主流，与其人的风格气度相表里的，是那些“风云”之作。所谓“风云”，与“儿女情长”相对而言，是有大丈夫气概，富于阳刚劲健之气，豪爽叱咤之风。如曹操的《短歌行》、王粲的《从军诗》、刘桢的《赠从弟》、曹丕的《艳歌何尝行》、曹植的《白马篇》等，虽题材和主旨各有不同，风格气质却都是健举激昂，属于悲壮呜咽之声。检点张华的诗，《励志》九首被公认为迥异于“女郎诗”的代表作，其中“水积成川，载澜截清；土积成山，歆蒸郁冥。山不让尘，川不辞盈；勉尔含弘，以隆德声”。虽然造语不奇，甚至颇为枯窘，却有一种容载力，表现作者“器识宏旷”的雍容之态，是“风云”之作。然而，是否像何焯所说“唯《励志》一篇”外，其余都是“女郎诗”呢？事实恰恰相反，张华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自取新材，自拟新题，写出了多首“风云气壮”的长诗来。《轻薄篇》向为人称道，其中所写的贵游子弟：“足下金罍履，手中双莫邪，宾从焕络绎，侍御何芬葩！”不说他们如何纵情放荡，只看这出场的气派，那扑面而来的邪风和骄气，就不是“女儿”之柔所能相比的。又有《游侠》、《侠曲》两篇。前篇咏古代游侠，赞叹他们的功业和豪气，抒发自己的宁静守虚之志。后者叙述两位处境不同的侠士，一个身怀绝技，却被饥寒所迫，铤而走险，潦倒于风尘草莽；另一个意气干云，长街报仇，义无反顾：“宁为殇鬼雄，义不入圜墙，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怨，勇气加四方。”这形象，感激豪宕、生气勃勃，最能显出诗人的阳刚之气，风云之笔。《游猎篇》从汉代大赋中的有关铺陈的场面变化而出，并无新意，但笔墨粗犷，气势浩瀚，好一幅泼墨围猎图。《壮士篇》写急于功

① 参见陈沆《诗比兴笺》。

② 参见王世贞《艺苑卮言》。

业的志士：“……壮士怀愤激，安能守虚冲。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啸咤起清风。震响骇八荒，奋威曜四戎，濯鳞沧海畔，驰骋大漠中，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这样威武雄勇，满怀功业之望，投身血火战场的英雄人物，得“风云壮士”之称是不容怀疑的。此诗和曹植《白马篇》为同一类型，下启鲍照。这种诗也不是张华凭空高唱，而是他力主伐吴并取得胜利时的抒情之作，凝聚着诗人的热血和激情，内容充实，骨力劲健。毛先舒云：“张茂先诗，粗厉少姿制，却能存魏骨于将夷。傅休奕亦然。”^①读张华的《壮士》等篇，深感毛氏评得很中肯。故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又有：“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他早就表彰了张华的“风云”之气，认为并不算少，乃是实事求是的灼见真知。不知钟嵘何以在当时竟作此论？

四、潘岳之《闲居》

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评潘岳时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氏有鉴于某些诗文书画，内容堂皇正大，高逸不群，究其作者的为人立身，却污行缺德，不足为训，做的不像说的好，文章内涵风韵与作者的人品很不一致。如潘岳的《闲居赋》，写得超尘出俗，堪称“高情千古”，而本人却利欲熏心，品格卑下。因此，凡论诗文，必先论世而知人，才能不为表面文章所蒙哄。这道理说得很好，事实上此类现象不在少数。

然就潘岳《闲居赋》本身而言，若稍作客观考察，深感遗山之说不符作品实际者：一是并未完全“失真”，相反，倒是可以见到潘岳为人的。二是因潘岳“心声”的鄙陋，故不能评以“高情千古”。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则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这里所说的“言”，指言语；“书”，指写成文字的诗文。遗山化用此来说明有些人的言辞文章是虚伪不实的，《闲居赋》即是证明。遗山所指赋中失真之处应是那些理性的宣言和高调。

潘岳为什么要写《闲居赋》？据说是他在读《汲黯传》时，看到司马安官场得意，有“巧宦之目”，有感于自己的仕途经历而发出感慨。他在《序》中说：“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谓拙于用多。称多则吾岂敢，言拙信而有征。”《闲居赋》就是在守“拙”的基础上作文章的，有点自我“解嘲”兼“答客难”的味道。

和峤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官僚士大夫，虽然吝啬爱钱，却也直言敢谏，常品评人物得失，且有分量，很受社会重视。他死于元康二年（292），约在潘岳做长安令前

^① 参见沈德潜《古诗源》。

后。他说潘岳“拙于用多”，可谓言简而意深，是清谈家的谈吐作风。既抬举潘岳多才多艺，又讥讽他为人所利用。“拙”字尤其尖刻，表面上好像在说潘岳憨厚单纯，不善巧变；骨子里则嘲讽他不知进退，一味趋附。和峤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据《晋书》所载，潘岳二十三岁左右受权要人物贾充的荐拔，举秀才为郎官，复因“才名冠世，为众所疾”，遂栖迟十年。三十岁出为河阳县令，郁郁不得志，牢骚满腹。不过，他在任时，是关心国计民生的，曾上书力辩大路上设置民间旅舍的好处；在河阳县内种满桃树，颇有经济眼光，因“勤于政绩，补尚书度支郎，迁廷尉评”，是一位很不赖的中下级官吏。但他因事罢免，再受聘于得势的权臣杨骏，作府中主簿，即秘书之类。贾后搞政变，杨骏被诛，潘岳也被判死刑，后得友人公孙宏的帮助，才免遭刑戮，还当了长安县令，重新投入贾氏门墙，官场生涯可谓曲折，其时才四十多岁。在和峤看来，这不是“拙于用多”吗？何况和峤在当权时，潘岳也因他爱管闲事而大为不满，曾题《阁道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輶，和峤刺促不得休。”后来和峤不冷不热地品评他，自有一点“颜色相许”的情绪，然说的是真话。这样一来，潘岳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怎能不想加以洗雪呢？他从长安令被召博士，没有上任，大约因为出身寒微的母亲曾说：“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到了这般处境，只有作一篇堂皇的《闲居赋》，配合自己因“亲疾免官”的“闲居”行动，替“拙于用多”来洗刷一番了。

其实，他身虽“闲居”，而心里并不闲。五十岁时“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等辄望尘而拜”。代贾谧作诗赠陆机，于其座中讲《汉书》等，成了贾家的文学侍从。“知命”之年的高才之士，竟这样躁进，人格确实欠佳。于是，他在《序》中一面承认：“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把自己的急于利禄高尚化。另一面又故作清高：“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乎？”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对和峤所讥之“拙”，装作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样子，好像和峤批评自己拙于处世行事，不懂人情世故，说中了，今天就该不“拙”而“闲居”的。这是伪善，是掩饰之辞。元遗山所以兴“文章宁复见为人”之叹，正是从《闲居赋》的这种宣言和高调出发的，是有道理的。

问题在于另一方面，我们若把“心画心声”扩大开来，也从诗赋的艺术意象来理解，那么《闲居赋》中那些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景物描绘，生动的人物情绪，愉悦富丽的生活画面，不正是作者声与画的具体表现么？那么，赋中究竟表现了潘岳怎样的心声，怎样的情趣，怎样的人品格调呢？

赋中以大部分篇幅描述他所“闲居”之地环境之美好及其自得之兴致。先点出地利之美，“陪京沂伊，面郊后市”，水上有浮桥可通，宅旁有灵台高耸，西面是皇家禁军的驻地，每天都在操练，“炮石雷骇，激触虬飞，以先启行，耀我皇威”。东边有